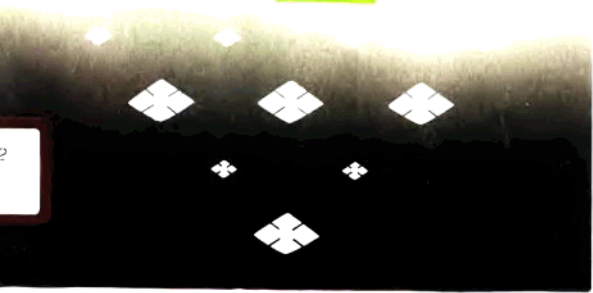


黄中模 著

与日本学者讨论  
屈原问题



## 内 容 提 要

近五年来，中日两国一些学者就屈原问题进行了一场论争。本书作者在这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他新近写的与日本著名学者冈村、繁、白川静等教授讨论屈原问题的文章均汇编于此。本书系统地评论了日本学者的各种“屈原否定论”；对日本学者论及中国“《楚辞》学”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用新的材料作了详细的辨正。附录的日本著名学者研究屈原的文章，能使读者兼听则明，独立思考。

本书是首次与外国学者讨论屈原问题的专著，内容新颖，资料翔实，论点鲜明，论证深刻，评论了近六十年来国内外的“屈原否定论”，不仅是系统地研究“《楚辞》学”史的著作，而且是中日两国学者进行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

## 序 言

司马迁为屈原写传，并非杜撰而凭空虚构出诗人屈原来。他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班固用历史学家的眼光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并说“刘向、扬雄博辩群书，皆称还有良史之才”（同上）。他们作为汉代人，离司马迁年代不远，竟然如此推重司马迁的《史记》，称之为“实录”，可见司马迁记载屈原的事迹不是假的。否则，班固在《汉书》里，是不会重述《史记》关于屈原的事迹的。

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屈原传，有某些不够明确的地方，但屈原事迹的基本线索是清楚的。司马迁作为我国第一个历史学家，他开创性地编纂汉武帝以前两千多年的一部通史，除受史料不完备的限制，同时，他身遭极刑，悲苦不堪，仓促之间，缺乏充分时间整理修订书稿，舛讹之处，自然在所难免。我们不能因为《史记》中有关屈原的史料有点漏洞，就以偏概全，否定屈原实有其人。《战国策》没有屈原的事迹，这有多种原因。上古时期变化甚大，古语亡佚颇多，可能有关更多的屈原的史料，没流传下来，或者还有待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发掘。

诚然，在中国古籍中，存在着真伪问题，应当进行考证，辨伪存真，这对科学研究，是有益的。然而，绝不能轻易怀疑，更不能在没有确凿史料根据的情况下，就贸然否定历史人物。在中国否定屈原及其著作权的有序季平、何天行等；在日本有冈村繁、三泽玲尔等。日本的“屈原否定论”者，大都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以讹传讹，变本加厉，愈走愈远。他们的研究方法皆不科学，经不起推敲。对此问题，我曾在《评〈屈原否定

论者的研究方法》一文中，作过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黄中模同志对屈原及屈原论争史颇有研究，占有史料甚丰，因此，他写出的文章则更有说服力。针对日本学者“屈原否定论”的种种观点，黄中模同志写出一批文章，予以驳难，澄清许多混乱问题，还原屈原本来面貌，他是作出很大贡献的。他把这批文章编集成书，交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欢迎这本书能够早日面世，传遍神州，走向世界。

学术问题，应当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相互探讨，取长补短，以推动学术研究的开展。本书说明，中日两国有些学者，尽管对屈原的看法不同，但仍在友好的气氛中，相互探讨屈原的研究问题，这不仅加深了相互了解，交流了学术思想，而且也进一步增加了友谊。我们祝愿中日两国学者，今后更应携起手来，进行文化交流，为促进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事业，继续共同前进。

### 陆 永 品

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88年6月22日

## 前 言

论以穷事理，争以辨然否。故刘彦和有“弥纶群言而研情一理”之谈，马克思作“真理是由争论确立”之说。自古以来文苑中的论争，波涌云诡，而对屈原问题长时期的讨论，尤为色彩缤纷而引人注目。

有关古代对于屈原问题的讨论，已在拙作《屈原问题论争史稿》中略举其要。最可书写的是时至今日，对屈原问题的讨论却飘洋过海，飞渡东瀛，形成了中日一些学者之间的一场论争。

这次讨论从1983年底开始，在1985年前后形成热潮，至今仍在继续中。其规模及中日两国一些学者的观点，已详述于国内数十家报刊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故不赘言。

然而为何要与日本一些学者讨论屈原问题呢？这是有人提及，也是不能不叙述的事儿。

从1981年起，当我们了解到日本一些学者的“屈原否定论”之后，便有心推波助澜，使之形成讨论的热潮。我们经常考虑到的有：

首先，我国从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惊采绝艳”，“百世无匹”，作为炎黄子孙，应当维护真理的光辉，使之在世界上发扬光大。

另外，中日两国学者，虽然在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后浪超于前浪。然而由于大海的阻隔及其它一些原因，彼此总有一些不够了解的地方。特别是日本学者，对《楚辞》的重视与研究，源远流长；无论对其古籍的整理与研究考证，是肯定还是否定，均有可资借鉴之处。而借助于屈原问题的讨论，就能加深这方面的了解促进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

再者，我国自1940年以来，在闭关自守被打破的情况下，一些思想家对外国文化实行拿来主义，固然有利于我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但缺乏同外国学术界直接广泛地讨论学术问题，对我国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向国外介绍也是不够的。若能选择一个有国际意义的话题，和外国学者进行对话，增加文化交流的窗口，以吸引世界人民和学术界的注意，也是较有意义的。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又有日本一些学者提出怀疑，选择这个题目来展开讨论，就能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为向世界介绍我国优秀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怀着这个目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起了中日两国学者就屈原问题的一场论争。从现在已发表的文章看，双方讨论的：《楚辞》是否为“民族歌谣”？屈原作品是否系“楚巫集团”所作？以及如何看待何天行的《楚辞新考》等问题，绝非仅仅是旧事重提而又可有可无的；在新的层次上进行对话，已非过去同廖季平、胡适等人的论争可同日而语。

几年的讨论证明，除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突破了原有的屈原研究的水平之外，对于一些讹传误解，也有一朝清廓之用。特别是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也不能忽视。例如去年日本学者三泽玲尔先生访华，与笔者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共同讨论屈原问题，增进两国学者的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取得了一致意见，这说明讨论屈原问题，增进了两国民间的友谊。再看日本九州大学著名教授冈村繁先生的来信，认为笔者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的论著所论述的，是他以前“一直渴望详求的问题”，而且将向他们的“青年学者”，介绍“有关的部分内容”，并“确信今后在日本将会引起很大关注”（见冈村繁教授给笔者的一封信），这也说明这次讨论，已为两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增加了联系的纽带。还有美国旧金山华裔学者徐超庸先生来信，除了索取论争的有关资料以外，表示将撰文“讨论屈原否定论问题”，认为这是“弘扬我国文化”。这更说明，这场论争正在受到欧美学界的注

意。

本书收录的文章，有一部分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过，有一些尚未发表，但都是近几年在中日学者讨论屈原问题的论争中撰写的。文章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针对日本学者的各种否定论，就主要问题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讨论；

第二，就《楚辞》研究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同日本学者商榷。由于日本学者对从扬雄到清末的廖季平，从何天行到闻一多、郭沫若的《楚辞》研究均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因而有必要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其中有许多论点和论争是过去未曾探讨过的。

第三，附录了日本学者几篇介绍与提倡“屈原否定论”的文章，便于读者进行比较研究，做到兼听则明，有所鉴别。

读者看了这些文章之后，就能知道所论及的是非曲直，较之国内外名家的高论宏议，虽有阳春下里之别，乃属巴人疏浅之谈，但能言由衷出，论之有据。论述虽不敢自许新颖，但对有些重要问题，自不能人云亦云，论证要尽量依靠第一手资料，研讨也务求水落石出。

正因此性成癖，数年来在讨论问题与撰写文章过程中，辄遇重重困难；加以学浅言轻，确曾备尝艰苦。或寻师访友，或搜求资料，或研讨问题，或争取发表，暑去寒来，不惜踏遍国内主要图书馆的大门；沐雨栉风，甘心呼吸祖国南北车道上的尘土。虽然萧高瑟瑟，案椅凝冰，实幸春光融融，大地增暖。一部部珍藏的典籍，一封封雪片般的华翰；多少关注的目光，多少热情的叮咛来自长江南北，来自大洋彼岸；书写于病榻之旁，邮寄于硝烟之中。既有熟悉的领导与师友关怀，也有陌生的专家与同胞的批评或鼓励，均给笔者以巨大的鞭策和鼓舞。正因有时代的春风雨露，才有这片小草的生长！

至于文章有诸多疏陋，笔下有未尽之曲致，实所难免。敬祈

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只要能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起到搭桥铺路的沙石作用，就尽到笔者的一点心意了。

黄中模 1988年1月  
于重庆师范学院《楚辞》研究室



# 目 录

## 评日本学者的各种“屈原否定论”

- 评日本学者的“屈原传说”论…………… ( 1 )
- 《楚辞》是“民族歌谣”论商榷…………… ( 20 )
- 评《楚辞》为“巫祝者的文学”论  
——日本白川静教授的“屈原否定论”的实质…………… ( 43 )
- 谈《屈原问题考辨》中涉及的有关《史记·屈原列传》  
的一些争议问题…………… ( 70 )
- 屈原“仅止于是一位忠臣”？  
——评冈村 繁教授的“屈原观”…………… ( 82 )

## 与日本学者讨论《楚辞》 研究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

- “语言魔术师”与“圣贤”  
——评日本学者对扬雄评论屈原的误解…………… ( 93 )
- 班固为什么要攻击屈原“露才扬己”？  
——与日本学者谈班固评骚理论的实质…………… ( 100 )
- 论司马光及其《通鉴》对待屈原的态度…………… ( 108 )
- 廖季平的《楚辞新解》未曾否定屈原  
——兼论廖氏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变化…………… ( 116 )
- 谁是“刘安作《离骚》”论的始作俑者？  
——评许笃仁的《楚辞识疑》…………… ( 127 )
- 一部错误百出的《楚辞》研究著作  
——与日本学者讨论何天行的《楚辞新考》…………… ( 137 )
- 评卫聚贤的“屈原否定论”…………… ( 158 )
- 评丁迪豪的《〈离骚〉的时代及其它》…………… ( 164 )

与日本学者讨论孙次舟的“屈原是文学弄臣”论·····	(177)
与日本学者谈闻一多是怎样评论屈原的?·····	(194)
论郭沫若研究屈原的历史功绩·····	(209)

**附录：日本学者介绍与倡导  
“屈原否定论”的著作及其他**

<b>屈原否定论系谱·</b>	
稻畑耕一郎著 韩基国译·····	(230)
《楚辞》与屈原传说	
铃木修次著 韩基国译·····	(250)
<b>屈原问题考辨·</b>	
三泽玲尔著 韩基国译·····	(252)
《楚辞》与屈原	
——关于主人公与作者的区别	
冈村 繁著 孙东临 译·····	(270)
《楚辞》文学	
白川静著 韩基国译·····	(294)
国内各报刊报道中日学者关于屈原问题论争的目录·····	(331)
后记·····	(332)

## 评日本学者的各种

### “屈原否定论”

## 评日本学者的“屈原传说”论

屈原是我国战国后期的伟大爱国诗人，这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但是，自从辛亥革命以来，我国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中，却有少数几个认为屈原仅仅是一个传说人物。

胡适说：“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①

何天行云：“屈原的传说，却完全是虚构的人物”，是“西汉末的产物”。并声称他是“对于胡适的主张，加以具体的补充和扩大”。②

由于何天行的观点在解放前未受到批判，近十多年来，这种“屈原传说”论，似乎又在日本学术界露头了。例如：在1968年，有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先生同日本一些教授、副教授共同主编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在此书的“导论”中，铃木先生论述中国“古代文学的特征”时说：

……我认为，《楚辞》是从宋玉之后才开始有个人之作品。屈原名下流传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着屈原传说，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其大成而产生的文艺。③

如果说铃木修次先生在文章中对其论点的论述与证明还不够十分具体的话，那末，三泽玲尔先生的《屈原问题考辨》就毫不含糊地说：“屈原只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主人公。”<sup>①</sup>他还用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和沈亚之的《屈原外传》所记录的屈原传说来证明他的“屈原传说”论。

可见，所谓的“屈原传说”论，是某些企图否定屈原的人的主要论点。

我们认为传说是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历史是人类社会已经过去的事实。二者虽然有联系，但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屈原的存在，不只是流行在民间传说中，而是历史。这是我们同“屈原否定论”的论争的焦点。

### 屈原是历史人物不容怀疑

真理是在论争中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研究事物的矛盾，从论争双方的论点中清理出真理，是我们认识“屈原传说”论的错误实质的好方法。

屈原作为历史人物被载入古籍与史册，自汉初以来，有贾谊的《吊屈原赋》、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史记》、《汉书》及《论衡》等。自王逸的《楚辞章句》问世以来，《楚辞》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其中心人物就是屈原，自汉迄清，一直是历代有名的学者研究的对象，他的历史地位从来是崇高的。

到了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是将屈原作为历史人物来加以肯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也在他的《屈原研究》中，重点考察并肯定了屈原是战国后期的历史人物。全国解放以后，许多《楚辞》研究专家，在研究屈原存在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上，也有许多可喜的收获。上述古籍、名著与我国的屈原研究的学者，同“屈原传说”论者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

第一，论争集中在《史记·屈原列传》的真实性问题上。从廖季平、胡适、何天行到日本的三泽玲尔先生，都是以否定《屈原传》的真实性为立论基础，然后把屈原说成是传说性的人物。

至于《史记·屈原列传》的真实性，无论如何是否定不了的。怀疑此传的人，大都认为它是后人伪托。其实这是经不起反驳的。只要问及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太史公自序》、《楚世家》和《张仪传》等篇章中，为什么都记载了屈原之事？“屈原传说论”者便无话可答，因为他们不能证明上述篇章皆为后人假托。这可以作为《屈原传》的真实性的强有力的内证。作为外证的，有西汉桓宽的《盐铁论》。盐铁会议开在《史记》成书后不久。桓宽在《盐铁论》中曾引用《史记·货殖传》，明确地说是“司马子言……”，而《盐铁论·讼贤篇》则云：“夫屈原之沉渊……而见汨罗之祸。”这都说明《史记·屈原列传》在司马迁成书后不久就被桓宽引用了。因此，象何天行所说，《屈原列传》是刘向父子伪托之论，在《盐铁论》面前，是不攻自破的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考笔者最近发表的文章《谈〈屈原问题考辨〉中涉及的有关〈史记·屈原列传〉的一些问题》<sup>①</sup>，在此从略。

第二，在屈原的生卒年问题上，也与“屈原传说”论者有严重的分歧。

屈原的生年，是研究《楚辞》的人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两句，古今的研究者都认为是屈原自叙生辰。但对它的解释又极不一致。例如，清刘梦鹏在《屈子章句·屈子纪略》中说屈原生于楚宣王四年（公元前366年），而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在《屈原生卒年考》中则说屈原生于“纪元前335年”。前后相差三十余年。屈原生年的确定，本来是一项繁难的工作。但决不是绝望的；而“屈原传说”论者却在这里横生枝节，把“摄提贞于孟陬”也说成是淮南王刘安自叙生辰，如何天行、丁迪豪他们。当然，这是他们预定了

“屈原传说”论之后所需要做的事情之一，是不难理解的；不过，他们还作得很不踏实。何天行《楚辞新考》在为“屈原传说”论搜罗“内证”时，提到了“摄提贞于孟陬”句，他解释说：

《楚辞·离骚》，据注以为是夏正。夏正建寅。如《淮南子·天文训》：“正月建寅。”……又《天文训》：“太岁在寅，岁名摄提格，其星为雄。”今按《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句，即言太岁在寅，正月为孟陬，当用夏正无疑（王逸《章句》注）。……淮南王所用的是夏正，与《离骚》正合。按《左传》所载楚国记事与《春秋》相差一月，则楚国在春秋时当用殷正。……《离骚》中既用夏正，又适值与《淮南子》的著作同时，这是《离骚》为刘安所作的第三个证据。⑥

丁迪豪《〈离骚〉的时代及其它》在此基础上，又据《史记·历书》“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进一步断言：

《离骚》的著作年代，是在太初元年，西历公元前104年或稍后。

并强调：“这是信而有征的论断，不是捕风捉影的臆度。”⑦

何天行、丁迪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过去简直扯不清楚；但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五星占》，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秦简《日书》等资料之后，无论推算屈原生辰，还是评论何天行、丁迪豪他们的论据，就都有了一些比较可靠的历史的和科学的依据了。

首先，何天行根据王逸，把《离骚》首句中的“摄提”一词直接当成“摄提格”，就不见得符合屈原词句意思，同时，更重要的，反把屈原使用这个句式所表现的先秦岁星纪年行文特征完全抹杀了。《史记·天官书》云：

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

可见“摄提”有一义是“岁星”。这一点，王逸疏忽了，朱熹在

《集注》中把“摄提”解释为“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也”，也疏忽了。再看《五星占》，其第一章《木星》云：

东方木，其帝大浩（昊），其丞句窋（芒），其神上为岁星。岁处一国，是司岁。岁星以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其名为摄提格。其明岁以二月与东壁晨出东方，其名〕为单阏。……⑧

这说明，木星就是岁星，也就是摄提，只要岁星在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就叫“摄提格”。此外，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一件“利簋”，经汤炳正先生考证，认为铭文中包含的“岁贞克”三字，解释应是：“岁”指岁星；“贞”，当也；“克”与“辜”同，盖夏历十一月⑨。“岁贞克”是指周武王时岁星于周历正月晨出东方。这是先秦岁星纪年法的行文方式。《离骚》“摄提贞于孟陬”本可写作“岁贞陬”，与“利簋”铭文的行文方式相同，也是先秦时期纪年的行文方式。因此，“摄提贞于孟陬兮”，就是说岁星于夏历正月晨出东方。

这种岁星纪年法实行于先秦时期，与太初历纪年不同。《史记·历书》说：“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按焉（阏）逢、旃蒙……等十个岁阳名称产生于西汉年间，它们和十二个太岁年名相配，可以组合成六十个年名，以“阏逢摄提格”为第一年，类似于干支纪年法。这种西汉纪年法，在《五星占》和颛顼历的记载中，都是没有的。丁迪豪只取“摄提格”，丢了“阏逢”，显得十分轻率。

其次，“摄提贞于孟陬”相当于现行公历何年？过去虽然从《尔雅》、《史记》、《淮南子》、《汉书》等著作中可以见到一些关于岁星运行的记载，但由于与木星实际运行的情况不尽符合，与具体的历史年代不相关连，后人无法作出确切的推算。《五星占》出土之后，由于它将岁星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共七十年运行的实际位置记录了下来，才使推算岁星纪年情况有了较为原始的资料。《五星占》第七章的“木星行度”记载：木

星于“秦始皇元年”“相与营室晨出东方”。这就是说，公元前246年岁星出现于正月。再结合《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以木星运行的“恒星周期”与“会合周期”为依据，并参照《史记·屈原列传》提供的材料，原则上即可推算出《离骚》说的“摄提贞于孟陬”指的是哪一年。

我国的天文学家与《楚辞》家根据本世纪70年代出土的文物资料进行推算，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汤炳正先生的结论是：木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晨出东方，屈原即生于是月二十六日<sup>④</sup>。陈久金同志的结论是：屈原生于公元前341年周历正月庚寅日<sup>⑤</sup>。郭元兴同志的结论是公元前342年夏历十月初一日<sup>⑥</sup>。他们具体的推算方法不同，结论则较为接近。因为周正建子，公元前341年周历正月，即相当于公元前342年夏历十一月。由于楚国究竟使用什么历法目前尚无定论，因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一段时间。

这里附带谈一下，关于楚国的历法，陈久金同志主张“楚用周正”，这可能与屈原作品中谈到时令的地方有所抵牾。例如，《九章·抽思》云：“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周历的“孟夏”相当于夏历的仲春，不会有“短夜”可言。同时，陈久金同志也并未用先秦典籍来说明“摄提贞于孟陬”和《尔雅·释天》的“正月为陬”为何是“用周正”，而用《史记·历书》记载的太初元年历法来说明楚用周正，则论据还似乎不够充分。

郭元兴同志的“楚、秦闰用颛顼历，建亥为岁首，而非建寅”之说也值得商榷：第一，楚历若“建亥”，则较周历又提前了一个月，同屈赋中描写的时令矛盾更大。例如，《招魂》云：“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蓁蘋齐叶兮白芷生。……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岁首建亥（夏历十月），此时应是风霜季节，绝不会有这种自然现象。其次，郭元兴同志根据秦简《日书》来确定楚用秦历，也还有一些问题。其中的《秦楚月名对照表》：



十月楚冬夕	十一月楚屈夕	十二月楚援夕
正月楚刑夷	二月楚夏屎	三月楚仿月
四月楚七月	五月楚八月	六月楚九月
七月楚十月	八月楚燹月	九月楚献马 <sup>⑧</sup>

是秦取郢为南郡以后数十年间用的。从表中的语气看，应是秦人将楚人使用的历法统一于秦之颛顼历的对照表。如果是这样，那么，从“四月楚七月，五月楚八月，六月楚九月，七月楚十月”看，倒适足以证明楚使用的是夏历。如果不是这样讲法，从另外八个月份看，把“正月楚刑夷……”理解为“楚的正月名刑夷……”也会证明楚使用的是夏历。因为，已经有人提出，“刑夷”就是“荆尸”，其声类相同。《左传·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旧注：“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这样讲，很难令人信服。先秦文句尚简，不大会在一句话中重叠使用两个含有楚义的字。若把“荆尸”解为月名“荆夷”，则文意畅适，即：“春天，王三月，亦即楚武王正月，……”《左传·宣公十二年》还有“荆尸而举”句，“荆尸”也宜作为月令解。而“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所证实的却仍是楚用夏历。

还有屈原的卒年问题，古今的研究者也是见解不一，有卒于楚顷襄王初的说法，有卒于考烈王元年的说法，前后相差达三十年左右。其中较有根据的，是毕大琛、郭沫若等人。他们从《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出发，推定屈原卒于顷襄王二十一年<sup>⑨</sup>。近来又有人根据《史记·屈原列传》：“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以贾谊《吊屈原赋》作于公元前176年，上推百年，就是公元前276年，即顷襄王二十三年。但有的论者过分重视其中“百有余年”的“余”字，又将屈原卒年提到顷襄王十六、十七年之间。这就与上引《楚世家》记载的“拔郢”时间冲突了。其实，毕大琛、郭沫若之说，与